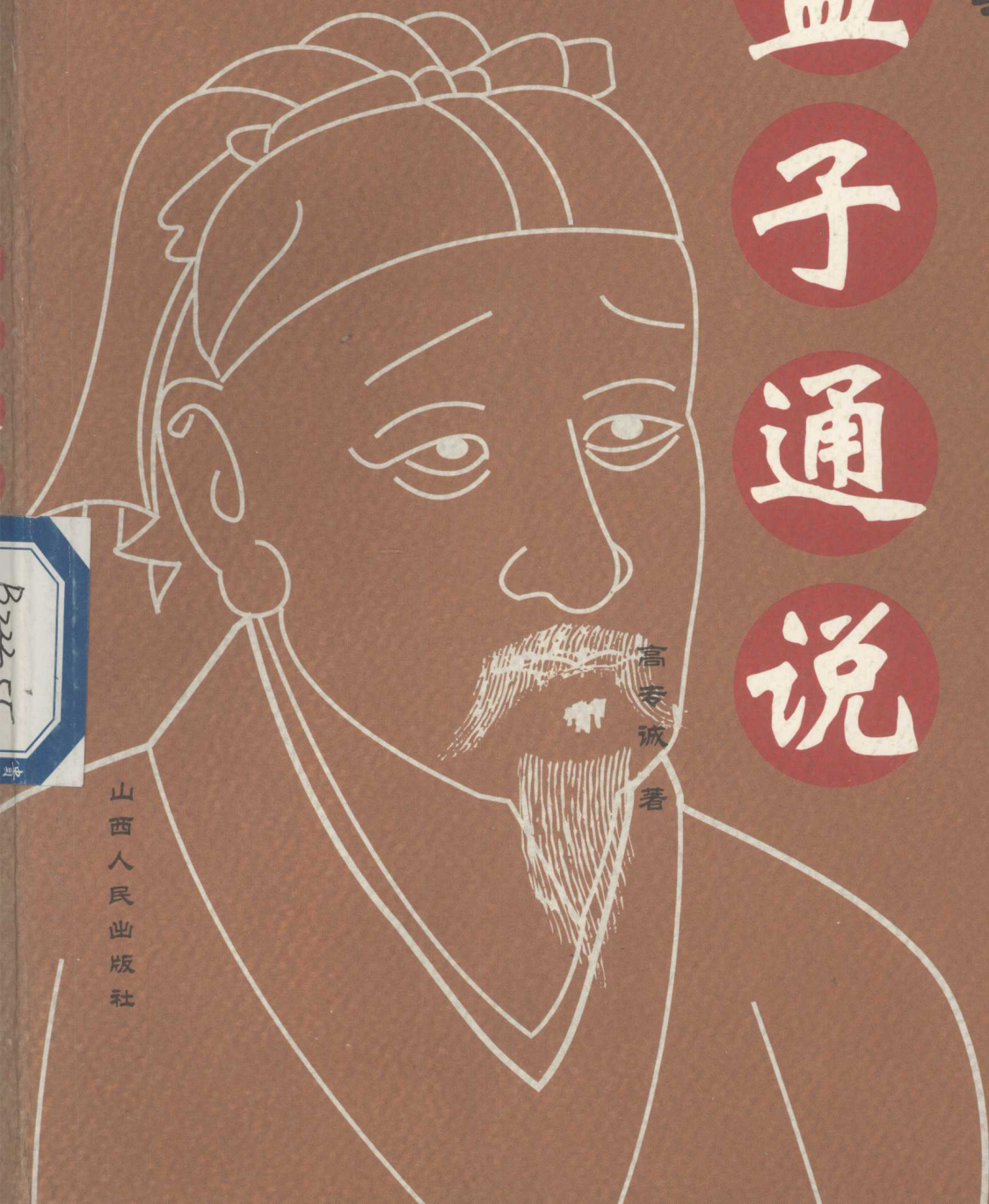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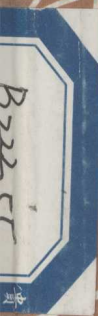


孔孟圣典

孟子通说

高彦诚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B222.21

孟子通說

高专诚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 编：于辅仁
复 审：蒙莉莉
终 审：刘秀斌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孟子通说/高专诚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4.1

(孔孟圣典)

ISBN 7 - 203 - 04926 - 4

I . 孟... II . 高... III . ①儒家②孟子 - 研究
IV . B22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1477 号

孟子通说

高专诚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 - 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新华印刷分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6.75 字数：28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册

*

ISBN 7 - 203 - 04926 - 4

B·92 定价：28.00 元



目 录

自序	(1)
绪论:孟门与《孟子》	(1)

第一篇 梁惠王上(001—007)	(1)
-------------------------	-----

☆与那个时代的多半思想家一样,孟子认为,决定天下走向和命运的是君主而不是普通人。这种思想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局限,但孟子真正要表达的绝不是人民的可有可无,而是对君主的严格要求。☆孟子的仁政虽然理想主义色彩相当浓厚,但其具体操作过程不仅是步步分明,更重要的是贯彻了在逻辑上的经济为先、道德随后的原则,也是非常现实的考虑;同时,他也强调了道德建设,即人的精神境界的提高,才是人类的最终目标。

第二篇 梁惠王下(008—023)	(18)
-------------------------	------

☆对于种种与实际生产无关的享乐,当时的许多思想家都持一概反对的态度,比如孟子之前的墨子和之后的韩非子。但是,儒家对此一般是怀着审慎的肯定态度。☆儒家承认合理的社会等级。人民只有安居乐业,君主的享乐才是可以接受的。☆无论君主做什么、怎么做,只要能考虑到人民的利益就是合理的。遗憾的是,天下的君主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与百姓分享,因为他们的贪求是无止境的。☆孟子对统治者毫不留情的批评,在专制时代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第三篇 公孙丑上(024—032)	(39)
-------------------------	------

☆告子是纯粹的思辨哲学家,这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上是非常难得的,但可惜的是,他的哲学思想只能零碎地见之于其他人的传述之中。☆只要有权力在,心悦诚服就是不太可能的。☆国家的兴衰存亡,根本上说是由自己决定的。在当初,诸侯各国力量都差不多,但到最后,大小强弱却那么悬殊,就说明完全是当政者自己的缘故。韩非子也说,正是人自身对勤劳和节俭的不同理解和实践,才决定了贫富的不同。☆做官不能完全靠自己,想赚钱也不是自己说了算。只有求仁,





是行是止,完全由自己决断。

第四篇 公孙丑下(033—046) (55)

☆孟子对君主的要求是,不仅要任用我,而且态度还要端正。这也许是孟子明知君主不可能任用他之后,认为与其任由君主摆布,还不如就此亮出自己的人格尊严,与君主做一番有骨气的抗衡。☆面对不同寻常的财货,孟子依然能够坚持自己的政治原则,以礼拒之,正表现了他所定义的知识分子的政治风骨。☆在专制体制下,职位与权力有时并不对等,因为与君主关系的远近更为重要。☆一个国家应该被攻打,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政治暴虐无道。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说,对这个无道之国,随便哪个国家都可以替天行道,出面讨伐。

第五篇 滕文公上(047—051) (72)

☆做人做事不要只盯着眼前,而是应该在认真做好当前工作的同时,还要心怀远大目标,以坚强的信念支持自己,以不懈的努力充实自己。☆传统重农思想的另一面是抑商,反对工商的发展,认为工商业是在赚取不义之财。可是,在孔、孟的思想里却是农商并重。这种难能可贵的思想,其根本基础就在于必要的社会分工的原则。☆在中国古代,抑制工商来源于政治专制的思想,因为发达的商业会对政治独裁形成最有力的威胁。☆任何平实之论,即使当下没有市场,终究也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而极端主义的主张,虽然当下比较容易招来许多头脑发热的拥护者,但却不能长久坚持下去。

第六篇 滕文公下(052—061) (87)

☆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传统中,做人做事是一致的。不能正直做人,就不能正直做事。同样,依靠阿谀奉承求得的官职,就只能以阿谀奉承的方式加以维持,也就不可能做出宏伟的事业。☆坚持原则是正直人生的必由之路。尽管原则的内容可以改变,但原则却不能没有。☆君子的行道尽管不能无原则地求取个人功利,但是,如果把功利全部抛开也不实际。能否得利,要以能否坚持原则为折中。无论君子行道也好,工匠做工也罢,只有动机与效果的统一,才能得到真正的认可,也才能有饭吃。





第七篇 离娄上(062—089)…………… (103)

☆国家只有选择和保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当然,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并不是说政治口号可以代替具体的行政措施。基础只是基础,而不是一切。☆从孔子开始,儒家就想以道德约束政治,但是,现实的当权者更注重实实在在的权力。这就要求儒家学者开拓新的思路,寻找儒学与现实的更有效的结合点。☆任何正直的思想家都不应该以世俗统治者的好恶决定其思想的取舍,但是,要想使自己的政治思想落到实处,产生预想的政治效应,还是要尽量克服其不切合实际的方面。☆个人的完善的道德修养,是否就能成就一个成功的政治家,还需要许多的其他条件。其中合理而健全的政治制度、法律精神,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第八篇 离娄下(090—122)…………… (122)

☆一国的当政者或一个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其主要职责是制定大政方针,而不是亲手处理具体事务。早期儒家的这种观点,与现代社会的治国精神是一致的,也是非常可贵的。☆战国时代的思想界之所以有百家争鸣,与处在各国分治情况下的知识分子相对自由的政治选择有着决定性的关系。在秦、汉以后大一统的形势下,士大夫无处可逃,只好任由当权者宰制。看来,在中国古代,只有现实的政治权力受到一定程度或某种方式的制约的时候,思想界才会万象更新。☆选择弟子也好,交朋友也罢,当然要注意对方的品质。但是,人也是会变的。特别是年轻人,可塑性很大,不可能一眼望尽他的一生。所以说,起初选择时要注意,在随后的交往中还要注意。

第九篇 万章上(123—131)…………… (142)

☆如果真有过所谓尧、舜两人禅让帝位、和平交接政权,从古代政治史的发展来看,也不过是一场精彩的政治游戏而已。☆孟子所说的上古时代的三次大的政治转折,即尧、舜、禹禅让,伊尹归政,周公摄政,到现在还是历史上的政治悬案。☆要了解和学习历史,或者从历史中有所取鉴,不仅要注意各种形式的历史记载,还要对相关记载进行理性的分析;至于好事者之间传布着的闲言碎语,更应该谨慎对待。孟子是历史决定论者,他不相信历史的发展没有规则,也不相信影响时代走向的历史人物的言行会受偶然因素的左右,以致出现不应有的



失误。

第十篇 万章下(132—140)…………… (158)

☆交友是儒学的基本功课之一。孟子的交友之道是:不倚仗长者的地位,不倚仗社会地位,也不倚仗亲戚的势力。☆处在孟子的地位,特别是在与各国君主的交往中,保持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不仅是个面子问题,更要紧的是一旦被君主知用后能否发挥其应有作用的问题。☆孔、孟并不是没有做官的机会,只是他们坚持的原则和方法总是不能与当政者的要求一致起来。所以,终其一生,他们也未能在现实中有效地推行其政治主张。☆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是个人才并出的时代,士人的际遇既是时代兴衰的标志,更是一国政治起落的标志。孟子抓住这个关节点大做文章,从而使儒学在当时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第十一篇 告子上(141—160)…………… (173)

☆至少在人性问题上,告子的观点比孟子的更公允、更合理。但是,由于后来儒学逐渐成为主流思想,告子的人性思想反倒成为孟子人性论的陪衬。对于告子思想的忽视,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缺憾。☆孟子确实强调了环境对人性之善的消极影响,但从善、恶两分的角度来看,环境本身并不是善和恶的来源,因为善人与恶人有可能生活在相同的环境中。☆对于世人的麻木不仁,孟子既急又恨,不惜从各个角度、以各种方式进行提醒和抨击。☆为了维护他的性善论,孟子在善和恶的来源上一直处在两难之中,并使这种两难处境进一步影响到了他的道德学说的哲学基础。

第十二篇 告子下(161—176)…………… (192)

☆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纯粹出于仁义目的的交兵和罢兵。如同单纯的利益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一样,单纯的仁义亦复如是。☆根据孟子的看法,从春秋时代开始,周朝政治史就走上了令人悲叹的下坡路。既然多少年来一直是“罪人”主宰天下政治,仁人志士当然就很难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了。☆军事手段肯定不是解决国家间矛盾冲突的惟一途径,也不是长远有效的办法。但是,在孟子时代,四平八稳地奉行仁义道德,事实上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治





国者本人有才能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任用贤人的品质和雅量。

第十三篇 尽心上(177—222)…………… (209)

☆孟子所谓天命,与孔子一样,指的是客观的时势和规则,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有意志的上天的命令。☆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并不是说我能够主宰外在世界,而是我能够掌握万事万物的原理或规律,从而认识世界,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这种精神追求,需要有大知识和大智慧,所以才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精神首选。☆从根本上说,思想家还是首先应该反思自己的学说,并设法让更多的人来理解,而不是片面埋怨世人的无知。☆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虽然需要花大力气,但提高的过程却是普通人觉察不到的。当然,也不能因为普通人觉察不到,就认为文化事业可有可无。

第十四篇 尽心下(223—259)…………… (231)

☆君子只要尽力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他就会接受所有的结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任何的社会进步都会伴随着不合理的、直至暴力的做法或手段,给当时的人们造成无尽的苦难。所以,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特别是志士仁人必然要发出抗议和呐喊,如同孟子一样。☆国家的财用充足实有赖于长治久安,而长治久安的根本在于遵循正确的政治方向。☆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总要遭到人们有意无意的议论。其实这并不要紧,因为君子小人之间的差距是不可改变的。



自序

世称“孔孟之道”，这可以理解为孔子和孟子的学说有着紧密的关联，甚至是相辅相成的。尽管在我看来，所谓相辅相成，更多的是孟学倚重孔学，但是，对孟学的研究，却可以增进对孔学某些方面的理解。毕竟，根据现有记载，孟子是历史上第一位以较多的和较系统的言论诠释孔学的思想大师。

本人研习孔子及其弟子的思想 10 余年，虽然经常涉及孟学，也不断参阅《孟子》，但总觉得对孟子及其思想缺乏较全面的把握。所以，此次撰写“通说”，真让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当然，这并不是说通过撰写一部书稿就可以达到对孟学的全面理解。相反，新的收获又引来新的难题；而新的难题，又激励我踏上新的探索之路。

世易事移，当今时代儒学已非“显学”，在这条探索的路上，艰辛可想而知。不过，幸与不幸总是相伴而生。想让人人诵读经典诚属荒谬，但是，求得二三同道，相互砥励，确非奢望。对我来说，更有幸者是获得“脉望图书”的支持，得以把多年的学习所得公诸世人，有机会求得更多的指教。

高专诚·2003年8月





绪论：孟门与《孟子》

1. 孟子生平简述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著名思相家，早期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孟子在世的时间已不可详知，一般人为大约是在公元前390—305之间。孟子的家乡邹国，春秋时称邾国，至孟子时改称邹。邹国是小国，与鲁国相邻，后为鲁国吞并。邹国的旧址，就是现在的山东省邹城。

鲁国曾有著名的“三桓”，即春秋初年鲁桓公的三个儿子，其中的长子始称仲氏。后称孟孙氏，世代做鲁国的上卿。据说，孟子就是孟孙氏的后人，所以，孟母去世后，孟子从齐国赶回，就把母亲葬在了鲁国。孟子年幼时父亲亡故，幸好孟母不同凡响，终于把儿子培养成人。历史上有著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说的是孟母为了给孟子找到一个理想的学习环境，曾经多次迁居。成人后的孟子也特别强调环境对人的成长过程所起的作用。

孟子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明显是孔子学说。可是，孟子自己说，到他那时，孔子过世已逾百年，想直接从孔门学到些什么，甚至从孔子的一传和再传弟子那里学到些什么，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据记载，孔子死后，他的弟子产生了思想分歧，孔学分为若干派别进行传播。孔子弟子大多生活在鲁国，而鲁国也有着孔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于是，早期儒学得以在鲁国产生广泛影响。孟子自称他的学问是私下里向人学来的，但具体是哪个人，孟子没有明言。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孟子的老师并不是杰出人物，二是孟子并没有过确定的老师。对于孔学的诸多传人，孟子几乎都有了解，但他惟独对曾（参）子倍加尊崇，同时他又认为，孔子的孙子子思继承了曾子的思想。后人就根据孟子的这种婉转陈述，认定孟子就学于子思的门人。其实，根据孟子的为人，他可能会夸大他所崇拜的某些人物的思想，但绝不会编造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如果他的学说确实来自子思，孟子是不会不大加宣扬的。可



是,孟子只是推崇子思的人格和思想,这就说明,孟子只想凭借子思来证明他的言行的正确性,并不想在实际的思想传承方面做文章。

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思想家一样,孟子也是积极的求仕者。孟子的时代,比之于孔子时代,政治上更加混乱,思想界也更加活跃。当时的儒学不仅不像后世那样是统治阶层的正统思想,而且还时时潜藏着被其他更加实用的思想学说挤出思想主流的倾向。于是,孟子双管齐下,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抨击其他学说,比如墨子之学和杨朱之学,另一方面也积极谋求各国诸侯采纳他的学说。为此,他也像当年的孔子一样,带领着弟子们周游列国,推行他的以“仁政”为核心的思想学说。

孟子的游仕范围不如孔子那么大,除了故乡邹国,就是邻近的齐国和魏国,间或也有宋国、滕国。这些国家的君主对他的态度都不错,这一方面是因为战国时代有礼遇人才的大气候,另一方面则是孟子本人所具有的才学和名气。但是,儒学从根本上不能适应战乱时代的需求,在孔子那里已经得到了证明。无论孟子本人如何坚信不疑,各国君主还是认为他的治国之道迂阔不经、中听不中用。所以,终其一生,与孔子一样,孟子也从未在任何一国得到过有实权的职位。在齐国,他做过一阵子客卿,类似于现在的政治顾问,只能出谋划策,没有决策的权力。这一经历尽管很令人失望,但孟子并未因此决定改变他的原则。相反,他给自己定下了更高的目标,专心致志地做一个思想家,为万世树立起道德榜样。

2. 孟子思想

与孔子一样,孟子也是首先想做一个政治家,所以,孟子的学说是定位在政治思想之上的。孟子思想的主干是仁政。围绕着仁政的推行,孟子展开了他的全部思想。孟子之所以认定仁政是天下政治的惟一正道,从人自身来说是基于人性的本善,从外部因素来说则有上古和近古历代圣王的事迹,以及他认为的由于没有推行仁政而引发的当时的社会矛盾。要推行仁政,政治当权者必须首先使自身的道德修养达到最高要求,为此,孟子又不断强调他的由修身达到平治天下的理想途径。平治天下当然不是一句话的事,所以,孟子也提出过一些实施仁政的具体方法,比如井田制、教育制度、意识形态以及用人之道等





等。所以,孟子政治思想的总归趋还是要用道德统帅政治。

当然,在劝说当政者增进修养、改变思想的同时,孟子自己也在着力培养合格的政治人才,这就是孟子的教育事业。虽然因为孟子思想的孤傲和褊狭,孟子弟子没有取得像孔子弟子那样的成就,但这并不妨碍孟子提出他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思想和方针。孟子弟子弥众,在孟子周游求仕的岁月里,追随在后的弟子达到过数百人之多。在《孟子》之中,留有名字的就有公孙丑、万章、乐正克、陈臻、公都子、充虞、高子、陈代、彭更、北宫、匡章、徐辟、咸丘蒙、桃应、屋庐子等十几人,虽然在人数上不及孔子弟子,但在当时也可以说是天下第一。由此可以看出,孟子对孔子的推崇不仅表现在思想方面,在实际行动方面也多有效仿,并从这一方面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了早期儒家的政治和学术传统。

与孔子弟子一样,孟子弟子也是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来自于当时的各个国家。因为每个人的背景不同,他们各自所关切的社会和思想问题也各有不同。有热中于求仕做官的,也有醉心于思想学术的。在与孟子的思想交流中,有关时政的,有关历史的,也有关哲学的。总体上讲,与当年的孔门一样,孟门的形成和对现实产生巨大影响的主要原因,也在于孟子与弟子所组成的有机整体的作用。没有孟子,就没有孟子弟子,反之亦然。

不过,《孟子》中的孟子弟子与《论语》中的孔子弟子相比,不仅在数量上有所不及,而且在思想水平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也有明显的差距。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孟子》中的孟子弟子很少有他们独立的思想表述。尽管他们向孟子请教的一些问题相当有深度,但却很少能与孟子展开更深入的讨论。这一现象可能与《孟子》的成书方式有关,因为《孟子》主要是记述孟子的思想,并经过了孟子本人审阅。但是,在孟子与弟子的相互讨论中,孟子弟子的表现并不突出。更重要的是,孔子去世后,孔子弟子大放异彩,形成早期儒学的一次新的思想高潮。可是,孟子去世后,战国中后期的儒学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高潮,特别是在齐、鲁一带,儒学的影响力甚至有下滑的趋势,根本无法与孟子在世时相提并论。当然,这可能与当时的天下政治重心逐渐向西方强大的秦国发生转移的事实有关,但孟子弟子集体影响力的平庸也是



不可否认的重要方面。

从孟子的一生来看,他也是现实政治中的失败者,这一点也与孔子相同。当然了,孟子也并不服输,他为自己一生的政治失意思考出了种种理由和对策,其中主要的是他的天命论,以及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强调。

在孟子看来,历史的演进和发展是有规律和规则的,并进而断言圣人和王者的出现也是有固定不变的时间上的间隔的。具体到每一位安定天下的王者的出现,孟子认为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当代帝王的任用和举荐,一是符合天命的要求。孟子所谓的天命,总体上与孔子的观点相一致,是指任何个人都不能改变的时势的趋向和要求。所谓时势,既有客观的条件,也有主观的因素。比如说王朝的更替,既需要有合乎道德规范的新王者的出现,也要有在位帝王的暴虐无道。在孟子时代,因为缺少能够整合天下的贤明的君主,当然也就不存在举荐继承人的问题。天下政治虽然混乱不堪,但还没有到了天下人不能忍受、进而显现出明显的人心所向的程度。所以,孟子的怀才不遇,没有机会改变天下政治的方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对于当时的政治状况,孟子虽然发出了很多不乏幽默或讥讽的尖锐批判,但从根本上讲还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即儒家思想还没有到了占据思想主流的地步。既然在现实政治的舞台上儒家思想无法取代更为流行的其他思想派别的各显其能,孟子索性就把自己的从政标准确定在非常崇高的位置上。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孟子更是利用自己在思想领域的成就和地位,与世俗当权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较量。在这种较量中,孟子不仅要求统治者给予儒士实际的政治权力,还要求当政者对于所任用的儒士表现出足够的谦恭态度。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孟子利用他的过人才智,从各方面阐述了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强调了士人无可比拟的尊荣,尽情表达了知识阶层的优越感。如果说孔子在社会分工思想的指导下明确了知识分子的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那么,孟子对知识阶层的做人做事所提出的高标准,则最终完成了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和知识阶层的定型。遗憾的是,随着秦汉以来政治专制的变本加厉,孔子和孟子尽力打造的知识阶层却未能如其所愿地发挥自己的独立作用,但这并不能减损孟子在这方面的历史贡





献。

与孔子思想相比,孟子思想在思辨性和系统性的显现方面有所加强,提出了一些关联明确的、前后一致的思想观点,其中最有力的是他的性善论。孟子的性善论并不是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人,而是从道德哲学的角度入手,为他的伦理学建立哲学基础。既然人的本性为善,那么,每个人就都有着先天的做善事、成善人的基础,甚至都有着成为圣人、造福人类的义务。孟子强调善的重要性,说明了恶的作用是存在的。但是,对于恶的来源,孟子始终没有明确的说明,这就导致了儒家内部以至整个中国古代哲学领域在人性论上的无休止的争论。

在整个儒学史上,孟子的地位虽然不及孔子,但他也有自己的长处。严格来说,孟子是儒家学派的实际建立者。虽然孔子弟子光大了孔子的学说,但孔学与儒学是有区别的。在孔子弟子的时代,孔学有它内部的百花齐放。可到了孟子时代,出于抵制其他学派之冲击的需要,以及孟子本人的学术倾向,孟子特别强调了由曾子经过子思传递而来的偏重于内省的孔学,并最终使孔学逐渐丧失了它的面向实际政治和现实生活的一面,成为一种纯学术的学问,即儒学。而孟学之所以在宋明理学的时代备受推崇,甚至超过了孔学的影响,也是因为孟学具有更强烈的唯心倾向。这样评论孟学并没有贬损孟子的意思,而是想进一步突出孟学的思想特色。

3. 孟子与《孟子》

孟子的思想主要反映在《孟子》这部书里。与《论语》一样,《孟子》也是孟子弟子所撰述,并且其中也不乏孟子再传弟子的增补。孟子大概也是效法孔子,决心述而不作。所以,他的言行只能靠弟子们记述。所不同的是,最早的《孟子》经过了孟子本人的审阅,而《论语》则产生于孔子去世之后。所以,在《论语》中有对孔子之过失的记载,也有孔子的自我批评,而在《孟子》中,孟子的形象就显得相当完美。《论语》中的孔子思想有可以讨论的余地,而《孟子》中的孟子思想则是不容置疑的。

据首次为《孟子》做注的东汉学者赵岐所言,《孟子》本有内外篇,内篇7,外篇4。赵岐把内7篇中的每篇又分为上下两部分,即现在《孟



子》的模样。7篇之名,与《论语》相同,是根据每篇篇首的字句而定,并没有特别的意义,而《孟子》的书名却不知定于何时。全部7篇(或14篇)《孟子》共34600多字,260多章。外篇共有4部分,计有《性善辩》、《文说》、《孝经》和《为政》,赵氏认为它们思想肤浅,与内篇不合,是他人依托《孟子》之名所著,就没有注释,因此也就没有流传下来,大概在东汉时就亡佚了。

《孟子》是孟子思想最可靠的记载和最集中的反映,但在当时,由于其他学派的思想更有影响,《孟子》的名气并不大,以至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作为诸子书中的一种,竟忽略了它。汉朝立国后,儒术抬头。汉文帝时,《孟子》与《论语》、《孝经》、《尔雅》一起被朝廷立为传记博士。《孟子》真正发挥它的影响,或许是从这时候开始的。自赵岐首注《孟子》,历代注本迭出,但最有影响的当数朱熹《四书集注》中的《孟子集注》。而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清朝学者焦循的《孟子正义》最为详博。今人杨伯峻的《孟子译注》在通俗读本方面先行一步,有比较广泛的读者基础。

本书取名《孟子通说》,与传统的注疏方式有所不同。在解释方式上,《通说》选择了串讲的形式,比较灵活,方便阅读。在串讲之中,还有意识地偏重于介绍《孟子》原文中的事件、人物和孟子思想学说的背景,以加深读者的理解。本书既没有传统的注释,也没有流行的“今译”,因为前者徒然增加阅读的烦琐,后者则显然过分机械,不能全面反映原著的内容。另外,本书还将原文分段编号,以便于查找,特别是书中着意提到的一些相关之处均以编号标出,以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理解孟子学说。



第一篇 梁惠王上(001—007)

001 - 0101○孟子见梁惠王。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shèng)之国，弑(shì)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yàn)。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在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梁国就是魏国，因为魏国曾建都于少梁和大梁。梁惠王之“惠”是谥号，意思是“爱民好与”，对人民有惠慈之爱。可是，据记载，梁惠王一生黩武不止，很难说对人民有什么恩惠。于此可见，帝王的谥号大多是其后代的粉饰。

根据周礼，只有周天子才能称王，魏国是韩、赵、魏三大家族瓜分晋国之后建立的诸侯国，只能称侯而不能称王，比如有名的魏文侯。但是，随着春秋以来周天子权势的旁落，称王的特权不断受到挑战。早在春秋时代，楚国和吴国就开始称王。这种称王的“僭越”举动虽然在当时受到各诸侯国的同声谴责，但羡慕“王”者称号的诸侯也大有人在，只是慑于别国的压力，不敢贸然行动而已。可到了战国时代，周朝的灭亡眼看只是个时间问题，于是，自以为国力强盛的魏国率先公开称王。不过，梁惠王的王号严格说来是在他死后由继位的梁襄王追尊的。《孟子》书中的孟子也称梁惠王为“王”，这恐怕是后人擅自改记的结果。

要弄清孟子为什么对梁惠王如此言说义利关系，一定要了解梁惠王这个人。梁惠王的先辈是有名的魏文侯和魏武侯。文侯和武侯在位期间是魏国的鼎盛时期。史称魏国是由盛转衰的国家，而梁惠王恰逢这一转折关头。武侯在世时未立太子，按当时的说法，“君终无适子，其国可破”，意思是说，君主去世时如果没有太子继位当家，这个国



家就会招致灭亡。魏武侯死后,子莹,也就是后来的梁惠王与公中缓争夺王位。子莹的力量稍稍占优,但还是未能阻止支持公中缓的韩国和赵国的乘虚而入。子莹被两国联军击败,所幸的是,在最后关头,韩、赵两国在是否除掉子莹的问题上意见不同,两国联盟不欢而散,才使子莹避免了身亡国破的结局。

就这样,从继位之日起,梁惠王就与韩、赵两国结下了不解之仇。终其一生,不是与韩、赵两国直接开仗,就是与两国的后台,齐国或秦国兵戎相见,比如著名的“围魏救赵”的马陵之战就发生在梁惠王在位期间。在相互仇杀中,魏国也有过占上风的时候,但毕竟不敌四国的不断瓦解。晚年的梁惠王眼看国力一日不如一日,忽然想到了先祖魏文侯招贤纳士的妙招。于是,先后有一些著名学者,比如邹衍、淳于髡(kūn)等纷纷来到大梁,向梁惠王面陈治国方略。此时的孟子正在 50 岁左右,已经是成了名的贤士,也兴冲冲地来见梁惠王。

不过,同是招贤,由于梁惠王与魏文侯面临的政治局势不同,主导思想也大有异趋。下棋有所谓急着缓着,治国也同样有急有缓。魏文侯时的魏国是强国,自然就能考虑一些治国的缓着,比如道德建设之类的长久见效的治国之策,并且也可以拜一些儒士为师,比如孔子弟子卜子夏等人。但梁惠王时代可做不到这些。事实上,并不是梁惠王不想做,而是不敢做,因为他自己不仅亲身经历过亡国的危险,而且眼前的政治形势明显对魏国极为不利。魏国极想摆脱眼前的不利局面,发展经济,达到国富兵强的目的。所以,看到孟子,梁惠王劈面就问:“老先生呀,您不远千里而来,肯定是有办法能让我的国家得利吧?”孟子的故乡邹地当时属于鲁国,与魏国的都城大梁相距不近,所以才有“不远千里”的说法。

根据另外的记载,梁惠王在求利于孟子之前,特别强调了自己的处境。梁惠王说,因为自己的无能,打了不少败仗,损兵折将,国库空虚,使自己愧对祖宗。所以,梁惠王所求之利,并不是与义相对立的利,也就是说,在梁惠王那里,求利并不一定意味着去义。可是,孟子不愧为了了不起的雄辩家,一下子就抓住了梁惠王话语中的漏洞,以见面礼的形式,结结实实地给梁惠王上了一堂政治课。

孟子说:“在目前情形下,根本不必说利,用仁义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为,如果大家都推崇利,那么,君主要为国求利,大夫就要为家族求利,而普通人也会给自己求利。上上下下都一门心思地取利,

